

岱海遗址群·7000年前的先民从何处来?



岱海遗址群出土的仰韶时期火种炉(资料图片)



文·摄影/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查 娜

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100周年。1921年,河南省仰韶村的考古发掘,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始。仰韶文化存在于距今约7000~5000年的黄河中游地区,其遗址主要分布于今河南、陕西、山西、甘肃、河北、内蒙古、湖北、青海、宁夏等省份。

作为仰韶文化北扩的重要区域,内蒙古发现了丰富的仰韶时期遗址和文物。仰韶文化发现百年之际,记者沿着其北扩的路线,寻访两代内蒙古考古人发掘的遗址,尝试还原一个鲜活的仰韶时代。那灿烂的2000余年,或可回答先民们从哪里来?曾怎样生活?又怎样走进历史长河?

农耕渔猎的史前生活

如今的王墓山遗址,是一片用围栏围起的缓坡,长着稀疏的树木。若不是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石碑的提醒,看起来毫不起眼。这里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西北17公里处,北距岱海南岸2.5公里,是岱海遗址群内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。10月中旬,凉城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红明带领我们来到这里寻访。

方红明介绍说,在王墓山的西北坡,自下至上依次分布有三处时代不同、内涵各异的文化遗存,因此被分别命名为王墓山坡下、坡中和坡上遗址。从500米以内的三处遗址发现可以推测,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,曾先后有三批人群迁移至此生活,留下那个时代的宝贵痕迹。

爬上距王墓山遗址600多米的石虎山的山顶,便可一览岱海全貌。作为内蒙古第三大内陆湖,岱海的面积约50平方公里,而在仰韶文化时期,它的面积是现在的4倍。岱海周边出现众多遗址,是因为先民们依靠着岱海及其周围良好的自然资源。

石虎山遗址是内蒙古中南部发现最早的仰韶文化早期代表性遗存,现在还有着当年考古发掘留下的痕迹,以及散落地表的红色陶片和石器残片。方红明捡起一块类似陶罐口沿处的红色陶片,指着两个对称的小圆孔告诉我们:“这两个小孔,有可能是陶器破损后,先民用修补时打下的。”

穿越数千年的漫长岁月,这些残破的陶片和石器,仍留在主人生活的地方,仿佛它们的主人昨天还在这里热火朝天地生活着。

根据考古发掘推测,在距今约6000年前,岱海周边曾是温暖湿润的宜生活区域。从中原地区迁徙至此的先民们,在向阳的山坡上建造半地穴式房屋。他们以农业生产为主,兼以捕鱼和狩猎,手工业生产水平和规模不断提高。他们使用的陶器有泥质陶、夹砂陶和少量的砂质陶。夹砂陶大多为炊具,泥质陶作做为容器和汲水器来使用,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,他们的生活用品有了一定的结余。

距今5500~5000年间,人类发展在内蒙古中南部达到了鼎盛时期。这一时期的遗址开始出现了环壕,说明当时已经有了稳定的部落存在。人们过着定居生活,房屋内出现用于储存物品的窖穴,应该是随着物品剩余量的增加而产生的。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面积较大的房屋,据此推测,当时出现了举行祭祀或议事的公共活动空间。

随着仰韶文化快速地发展和气候的变迁,社会结构在逐渐发生着变化,数百年后仰韶文化逐渐走向没落,取而代之的是龙山文化的崛起。

考古工作者的探索之路

在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文化遗址中,岱海遗址群是个颇有典型意义的小区域文化遗存。从考古成果看,岱海遗址群在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具有代表性和显著性;从考古方法看,内蒙古老一辈考古工作者,在岱海周边小区域内,以文化谱系的建立为基础,运用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开展综合研究的方法,创造了中国区域性考古研究的范例,在当时走在了全国考古工作的前列。

我们寻访岱海遗址群的前身今世,就像在两个时空维度中穿梭:一个维度,是六七千年前,这里人类的迁徙和融合的风貌;另一个维度,则是内蒙古两代考古人逐步还原历史的探索过程。

说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考古成果,离不开考古学家田广金的名字。1965年,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田广金,放弃分配到家乡辽宁的机会,来到考古工作刚刚起步的内蒙古,成为内蒙古文物工作队(即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)的一名考古工作者,并逐步成长为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、中国考古理事会理事、文化部优秀专家。

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在鄂尔多斯研究了十几年中国北方畜牧-游牧民

族文化起源和发展的田广金,将工作重点放在研究内蒙古史前文化谱系、聚落形态和人地关系上。1982年以后,田广金的研究区域转移到岱海地区,先后带队发掘了王墓山坡下、王墓山坡中、王墓山坡上、石虎山、老虎山等遗址,逐步建立了岱海地区乃至内蒙古中南部史前文化的谱系。

田广金在岱海地区运用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方法开展综合研究,创造了中国区域性考古研究的范例。在他任职期间,内蒙古的文物考古事业在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、环境考古、聚落考古、多学科合作以及国际合作等多个领域,都走在全国的前列。

然而,田广金不满足于文化谱系的梳理,不满足于聚落形态的揭示,甚至不满足于对古代社会状况的复原。他想知道的是,这一切后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?实际上,早在20世纪70年代发掘研究鄂尔多斯的朱开沟遗址时,这类问题就开始困扰他: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和北方从事畜牧业生产生活的群体是从何而来?一直到老虎山等遗址的发掘,考古学界才逐渐发现,北方从事畜牧业生产生活的群体是由长城沿线的农业人口转变而来,而由农转牧的原因,可能是气候环境变化造成的。



方红明介绍仰韶石器陶片



气候造成的人类迁徙

内蒙古一批又一批考古人的发掘和研究,提出了对中国北方地区仰韶时期人地关系的全新论断。以往,人们普遍认为北方地区一直是畜牧业区域,寒冷干燥、不宜居住。实际上,北方地区在仰韶时期非常温暖湿润。从后来的考古发掘可以印证,仰韶时期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甚至深入至草原腹地的二连浩特等地,都曾居住过很多农业人群。

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进入繁盛时期后,不断向四周影响、扩展。距今7000年前后,岱海地区进入中全新世早期大暖期,仰韶文化后岗类型、半坡类型、庙底沟类型人群相继来此进行农业开发。

当时,黄河中游地区人类活动频繁,使得中华文明在这一地区出现繁荣局面。可以说在“大仰韶”文化范围内,北方

与中原同根同源,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。

到了距今5500年的仰韶后期,气温开始明显下降,随之降水减少。从此,北方地区的农业发展放缓,畜牧业逐步发展。数千年来,内蒙古的中南部地区一直是气候敏感区域,农耕和游牧文明在此交汇融合,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面貌。时至今日,这种融合仍随处可见。在乌兰察布市,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“走西口”时山西人后裔,这里既有大面积的农耕区,也有以畜牧业为主的旗县。奶茶、手把肉和焖面、烩菜同样受欢迎。

内蒙古的考古人带我们认识了那个灿烂的史前时代。眺望仰韶时代先民生活的这片土地,岱海波光粼粼,夕阳下牛羊归圈,远处庄稼已经收割,仿佛那个鲜活的仰韶时代并未走远。



岱海遗址群出土的仰韶时期陶器(资料图片)